

农村人口空心化下酒席人情负担何以生成

——基于闽东D村的案例研究

叶 颖¹, 芮国强^{1,2*}



(1.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2.江苏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 当前农村人口空心化下,农村酒席人情负担问题日益凸显。减轻农村人情负担,事关农村移风易俗、推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搭建一个“关系—信任—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闽东D村为案例,深入探讨农村人口空心化之下,农村酒席人情负担的生成问题与减负路径。案例研究表明,在闽东地区的团结型村庄,其酒席人情负担的生成机理,围绕着人情网络延续、风险感知加剧、人情功能性异化、虚荣心理作祟而展开,并遵循人情关系往来从“互助性”到“功利性”、人情信任导向从“道德约束”到“利益驱动”、人情行为消费从“求均衡”到“互攀比”的演变逻辑。由此,提出农村酒席人情负担的减负路径,即发挥传统文化制度功能和民俗调适作用让人情回归本初、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拓展农民家庭的生存韧性、强化群众性自治组织整顿无序跟风攀比的不良风气。

关键词 农村人口空心化; 人情负担; 人情异化; 人情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5)05-0179-11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xb.2025.05.01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常住人口已经从2010年的约6.74亿下降至2024年的约4.65亿,占全国人口的33%^[1]。随着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出现了两种客观后果:一方面,全国众多自然村落的常住人口持续减少,沦为“空心村”;另一方面,居住在农村的人群中老年人数量不断增多,形成了“老龄化村落”^[2]。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对农村人情礼金往来产生深刻的影响,引发对人口空心化下农村移风易俗问题的广泛讨论。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中指出“持续整治人情攀比、大操大办、厚葬薄养、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完善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3]。这是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五年对移风易俗工作作出重要部署。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近年来全国各地扎实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并取得积极成效。然而,当前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存在人情名目泛化、人情礼金攀比、人情仪式异化等问题,甚至让人情异化形成了人情负担,束缚了农村移风易俗的步伐。在农村人口空心化下大量年轻劳动力涌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导致农村社会主体成员的缺位,并让留守的老人和妇女被迫承担起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的责任,通过强化物质化的人情礼金交换来维持社会资本。由此,传统的人情仪式异化为人情负担,并从“隐性负担”逐渐变为“显性负担”。农村酒席人情负担不仅加重农民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也疏离了农村的亲熟关系,影响农村社会的乡风文明建设。

农村基于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潜在运行规则。物质资源通过“随礼”的形式,在红白喜事及其他庆典活动等仪式场合中流转。“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

收稿日期:2024-09-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全过程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21@ZH032);江苏高校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NH33710921)。

*为通讯作者。

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4]。由此形成了一种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4]。然而,农村的“村门打开”和城市包容性的提升,导致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村人口空心化之下的社会生活,出现了熟人社会半熟人化的特征,也出现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现象^[5]。由此,符合农村社会公序良俗的人情往来“变味”,人情“异化”变成人情“负担”。如何理解农村人口空心化之下,从“人就位”到“钱就位”的农村酒席人情负担?其生成机理和演变过程如何发生?如何为农村酒席人情负担“减负”?这些问题的解答,是研究问题意识的来源。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框架

1. 文献回顾

对于农村人情问题的探讨,学界已经有较为丰富的研究积累,这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通过梳理已有研究,相关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是对农村人情消费及其功能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人情消费与乡村社会秩序是共生共长的文化现象,人情消费的高低涨落与地方社会的文化、伦理和社会秩序紧密联系^[6]。近年来,农村人情消费名目增多,消费范围不断扩大,礼金数额一路攀升,人情债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让农民逐渐不堪重负^[7]。农村人情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具体表现为互助互惠、自己人的认同与社会竞争^[8]。然而,受到经济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形态分化等现代性因素的影响,传统农村社会正在发生变革,传统的人情关系也发生了现代转型,其经济功能和利益工具性作用开始逐步凸显^[9]。

二是对人情社会形成的成因及其机理的研究。由于长期受到儒家“礼”的熏陶,在家族或者宗族、社区生活中人缘、人情和人伦被高度重视,从而构建了一套人情秩序,用以规范和约束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关系,并逐渐形成讲人情、重伦理的人情社会^[10]。这种人情社会形成的原因,还包括情感表达的需要、防范个人和家庭风险的需要、不当求利的需要^[11]。对于人情异化的机理和内在逻辑,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乡村原子化地区村民社会联系的薄弱、人的预期期望缩短、传统权威逐渐式微、人情敛财的冲动和集体不理性^[12]。也有研究指出宗教信仰对人情支出的替代及其影响机理具有城乡差异,在城市环境中主要表现为构建了人际信任,在农村环境中表现为促进了群体互助^[13]。

三是对农村人情异化及其治理的研究。农村人情异化即将人情工具化,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利”,即利用人情赚钱;另一个是“名”,即利用人情来进行恶性攀比竞争^[14]。在具体实践中,农村人情关系的异化,将引发酒席铺张浪费、大操大办、天价彩礼等一系列不良风气产生^[15]。面对农村人情的“异化状态”,人情治理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重任。为此,应通过权力下乡对农村异化的人情进行治理,从动员多元治理主体与重建公共规则体系两方面入手,并让国家权力适当介入,以重建乡村社会的治理体系^[16]。此外,行政力量的介入,关键在于公共规则与人情规则的协调统一,公共规则能协助抑制人情往来的名目,缓解其与人情规则的矛盾冲突,从而显现出一种“工具性权威”^[17]。

既有研究从多视角展开对农村人情问题的探讨,丰富了研究的视野,对于研究农村人情相关问题具有较大的借鉴作用。但是,现有文献关注的农村人情负担较高或者异化的经验,与1990—2010年村民主体成员在场的农村高额酒席人情负担相比,并没有呈现出新的不同。近年来伴随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入城市造成农村主体成员的长期“不在场”,导致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现象出现。为何农村人口空心化之下,村民主体成员不在场的农村共同体能维系高额的酒席人情负担?研究基于闽东D村的实地调研经验,探究农村人口空心化下的酒席人情负担,以期为农村人情问题凝聚出非正式治理的智慧。

2. 理论分析框架与案例选择

社会学领域中的差序格局理论是解释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的重要概念,选取差序格局理论论述农村人情问题具有理论的适切性。而社会交换理论是社会学界引导学者开展研究工作的一般社会学

理论^[18]。以闽东D村为案例,整合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搭建“关系—信任—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从微观个体行为的视角出发,克服以往相关研究中单一理论视角的局限性。同时,描述关系、信任、行为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这种动态的视角突破传统研究中的静态分析局限,也符合农村社会中复杂多变的人际网络和信任关系状况。

(1)理论分析框架的总体描述。以差序格局理论的“关系”和“信任”要素,以及社会交换理论中的“行为”要素,搭建“关系—信任—行为”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的理论逻辑在于,关系是分析框架的起点,是个体或组织基于血缘、地缘、姻缘等综合因素进行联系和互动;信任是立足于关系的基础上,延续个体或组织的联系与互动并保持稳定性关键;而行为是关系、信任的具体实践或者外在表现。关系信任能够驱动行为,行为的强化又进一步促进关系与信任的生成。农村酒席人情负担的生成,围绕“关系催生”“信任物化”“行为强化”而展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造成的农村人口空心化,对农村人情往来产生影响。人情关系往来从“互助性”到“功利性”、人情信任导向从“道德约束”到“利益驱动”、人情行为消费从“求均衡”到“互攀比”,农村酒席人情负担由此生成。(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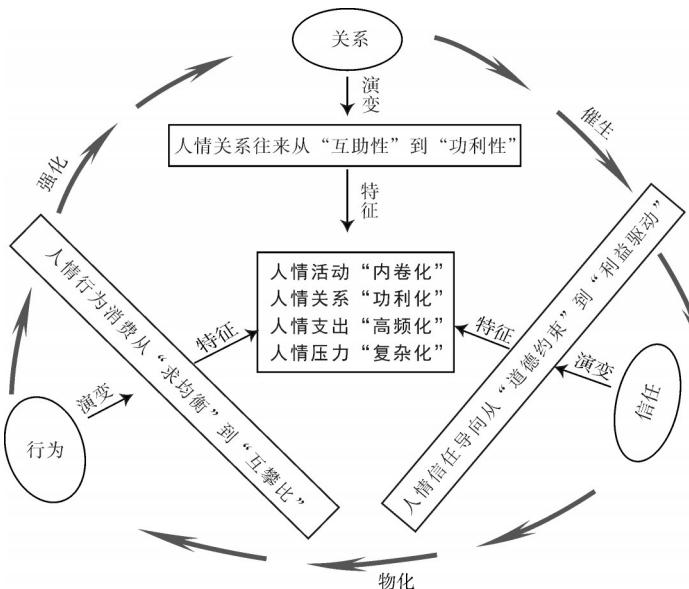


图1 农村酒席人情负担生成的分析框架

(2)理论分析框架的要素诠释。农村酒席人情往来,是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其内在体现了差序格局中关系的互动和信任的生成,其外在呈现出社会交换的行为逻辑。

首先是关系要素。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把自己置于人际关系的中心,通过他人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来产生联系,形成一种网状的关系结构,就像石子投入水中所产生的波纹^[19],即“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的“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人际的差序格局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差序信任关系,在人情互动网络中扎根并不断进行深化。在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通过各种人情关系来编造社会关系网络。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依靠人情往来与他人产生社会联系。

其次是信任要素。差序格局中“差序”的含义不仅局限于“关系的差序”,还包含有“情感的差序”,即人们根据相互之间心理情感亲密认同的差序,来决定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和信任关系^[20]。其中,交往关系与信任关系的运作机制也立足于人情往来的沟通与互动。以差序格局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信任,是人情交往中彼此都遵守的信念。长期以来,我国的信任结构基于差序格局,形成以“己”为中心,对离“己”越近的熟人信任度越高,对离“己”越远的陌生人信任度越低^[21]。在农村酒席人情往来中,表现为“强关系”带来“高信任”,“弱关系”带来“低信任”。然而随着人情关系的异化让信任发

生物化,信任导向从“道德约束”到“利益驱动”,在利益驱动下要承受更多的人情支出,从而增加了农民的人情负担。

最后是行为要素。社会学领域的交换理论,主要是从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和布劳的著作中诞生的。Homans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商品、物质与非物质的交换行为^[22]。这种行为不仅是人们交换商品、货币及其他物质性酬报(或惩罚)的经济行为,还包括交换赞赏、尊重、爱戴、谴责等非物质性的或象征性的酬报(或惩罚)的一切行为^[23]。布劳在其经典著作《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指出,社会交换在重要的方面区别于严格的经济交换,基本和最关键的区别,在于社会交换带来未作具体规定的义务^[24]。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人际的互动行为是价值互换的过程,人际之间的社会交换始于社会吸引,并且遵循着理性判断、自愿互惠的原则。最初人情往来的互利互惠就符合这种交换的行为逻辑,但是人情异化后则让人情交换变成“功利性”的行为。

(3)案例选择的适配性。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相关资料源于笔者于2023年7—9月和2024年2—3月,前后多次对闽东D村的实地调查。闽东D村是典型的南方宗族性的团结型村庄,村庄内的传统结构与规则较强,村庄内部也具有惩处违反共同原则的规则,外界力量很难突破村庄规范与共识^[25]。闽东D村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符合差序格局所描述的社会关系结构。该村位于福建东部地区,距离县城20千米,全村下辖4个自然村,是乡政府所在地。在农村人口空心化之下,流出的青壮年劳动力,受到传统宗族思想的影响,与原住地村庄依旧保持着较为紧密的人情往来关系。

二、农村人口空心化下酒席人情负担的生成机理

农村人情礼金的“工具性”助长了人情消费支出,熟人社会的农村受困于血缘关系与泛血缘关系,承受着日益增长的人情负担。明晰农村酒席人情负担的生成机理,将有助于剖析农村人情负担的生成、存续与发展的根源。

1. 人情网络延续:移动支付普及下的亲缘关系维系

传统的人情往来呈现出如下特点,“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26]。在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会建立一种群体内部成员间的特殊信任,这种社会信任模式通常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的特征^[27]。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是血缘的投影,形影不离^[26]。然而,这种传统差序格局下的熟人社会,随着农村人口流动的加剧而逐渐瓦解。数字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重塑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模式。在农村人口空心化之下,大量青年劳动力离乡离土。由于返乡成本高,离乡青壮年的人情礼金往来形式逐渐演变为利用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工具进行实时转账,避免脱离农村人情关系网络。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外出的农民不仅要负担农村人情成本,还要负担城市生活的人情往来成本,进一步增加了其经济负担(图2)。

调研中也发现,闽东D村的村民在酒席人情往来中,使用移动支付来完成人情礼金的比例并不少。“最近一次办酒席有30多笔礼金,是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发给我的,单笔的金额从300元到2000元不等,他们微信转账的,我们也会在礼金簿里面记一下。”(访谈编号:RHC20240211^①)移动支付的普及拓宽了家庭和社会的互动范围,也打破了传统家庭与社会互动的边界^[28]。尽管青壮年大量流出,让村庄的主体成员长期不在场,并形成了“无主体熟人社会”。但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春节返乡的人情礼金集中补偿,又让农村呈现出周期性的熟人社会特征,让传统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网络延续下去。

2. 风险感知加剧:寻求非正式制度的社会保障支持

随着城市扩张,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而农村人口占比为48.73%,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逐渐加剧,人情名目泛滥

① 访谈编号的编码规则:前三位字母,分别为访谈闽东D村的4个自然村的首字母缩写,后8位数字为访谈日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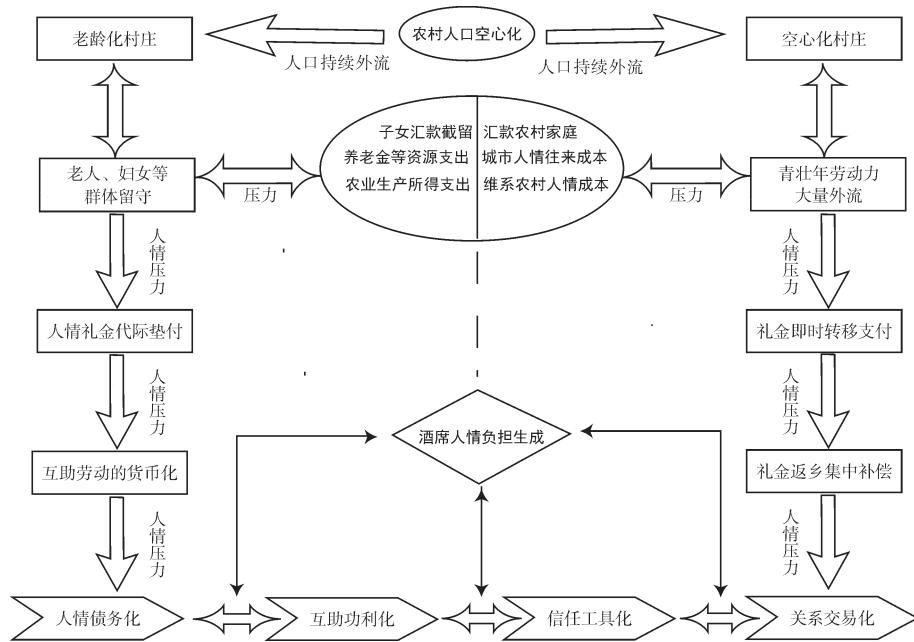


图2 农村人口空心化下的酒席人情负担生成

成灾、礼金持续飙升、人情攀比成风,让人情负担从“隐性压力”变成“显性债务”。具体而言,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后,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妇女面临两个方面的负担,一是人情礼金的代际垫付,二是互助劳动的货币化(图2)。人情礼金的代际垫付,主要是因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但是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妇女,为了维持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和寻求非正式制度的社会保障支持,被迫承担起人情礼金的垫付责任。尤其是老年人的代际垫付,需要从子女汇款中截留部分用于人情礼金支付,甚至挪用或挤压他们的养老金资源用于人情往来。而互助劳动的货币化,表现为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妇女,面临传统红白喜事中的互助劳动从“互惠化”变成“货币化”。人情往来中的互助劳动被明码标价,酒席人情仪式变成“敛财工具”。为了预防和应对风险事件,农村居民通常通过两种主要的社会支持途径来获取帮助,即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出台前,农村地区的人情酒席往来通常被看作是重要的非正式保障形式。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保障,依赖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亲戚、邻居、朋友等熟人群体的帮助,通过人情往来和互助劳动来共同分担风险^[29]。在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不少农民将人情礼金往来当作是非正式保障的补充。农村人口空心化过程中,传统的互助劳动因为留守劳动力不足而难以维系下去,雇佣劳动兴起,而互助劳动也变得“货币化”。留守的村民转而通过人情礼金往来的“人情投资”,来弥补互助劳动缺失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

3. 人情功能性异化:人情互助功能的攫利性转变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不断流失,传统的农村家庭人口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熟人社会的互助劳动体系也随之出现“瓦解”的趋势。虽然青壮年群体长期脱离乡土社会,对村庄内的人情网络依赖度逐渐降低,但是出于对留守亲属的庇护保障需求,仍然需要通过人情礼金往来维持人情关系网络。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让原本依靠互助劳动的农业生产、婚丧嫁娶等活动,因为劳动力不足而转向依赖市场化服务,传统红白喜事中的互助劳动从“互助互惠”转向“金钱交易”。随着青壮年外流后,其家庭在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维系责任,转移到留守的老人和妇女身上。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成为农村人情往来的代理人,但由于经济能力有限,过度的人情酒席礼金会透支他们的家庭。事实上,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涉及工具性和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情感,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中得到诠释^[30]。最初以满足情感需求和防范家庭风险的人情往来,出现工具性与情感性的功能分割,异化形成了人情负担。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种酒席人情名目接踵而来,礼金数额也不断攀升,人情仪式从“纽带维系”变成“人情储蓄”,人情蜕变为敛财的工具。人情的功能性异

化导致人情往来变成一种投资行为,由“给予一回报”演变为“投资一收益”,人情的攫利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彰显,也加剧了人情的经济负担。由于缺乏预期的回报和回报成本的上升,部分人开始考虑如何在短期内回收人情,甚至清算人情。这就导致在新一轮的人情往来中,情感性的需求被逐渐弱化,而工具性的表达被强化。最终人情消费的“货币化”“功利性”等异化趋势日益凸显,并被打上经济效益的烙印^[31]。

4. 虚荣心理作祟:人情消费行为的盲目攀比跟风

农民的人情攀比,多数发生于熟人之间、类似家庭状况的农民之间、本村村民之间,其核心动机呈现为获取心理上的自我满足、获得真实的利益、获得群体归属感、促进自我进步^[32]。在闽东D村,不同名目酒席的举办规模、花费、宴请宾客都有所差别,但是存在明显的攀比风气。由于婚丧、乔迁、做寿、升学等各种酒席的举办规模不同,以及相关随礼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处以访谈对象的最近一次举办的乔迁酒席为例(表1)。

在表1中,由于关系亲厚程度不同,人情随礼的金额也有较大的差异。不同人的经济状况不同,收入水平存在差异,随礼金额多的人会无形中拉高随礼金额的门槛,形成一种攀比。此外,传统农村酒席食材以家常菜为主,村民的互助劳动能有效降低酒席的开支。然而,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城,接受了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返乡大肆操办酒席成为他们彰显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城市元素融入农村酒席人情后,外包酒席、酒店宴席、策划公司的引入都在无形中推高人情仪式的成本,也形成了一股人情攀比的不良风气。酒席的规模、宴请人数、酒席上的菜品、烟酒都是攀比的重点。由于距离县城很近,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会选择去县城的酒店里办酒席进行攀比炫耀,充分满足自身的虚荣心理。“自家办酒席,烟酒、饮料、厨师、帮厨、桌椅凭租不算,仅仅菜金的基础就是1300—1500元左右,如果算上其他的那肯定一桌要花两千多甚至三千块钱。要是去县里酒店办的话就是酒店的套餐,菜不能自己挑选,花费也会更贵。”(访谈编号:TTY20240211)农村人情礼金和酒席的攀比,已经形成一股恶劣的攀比风气,让农民的人情负担不堪重负。

三、农村人口空心化下酒席人情负担的演变逻辑

在农村人口空心化之下,农村酒席人情负担的演变逻辑,主要沿着演变起点、演变主线和演变指向的路径前进。在演变起点上,人情关系往来从“互助性”到“功利性”让人情开始“变味”;到演变主线环节,人情信任导向从“道德约束”到“利益驱动”,在经济上要付出较大的人情支出,加重了人情负担的经济压力;最后到演变指向,人情的行为消费从“求均衡”到“互攀比”,这种“攀比”心理的产生,将人情负担推向顶峰,将整个人情往来的指向带到逐步“异化”的轨道。

1. 演变起点:人情关系往来从“互助性”到“功利性”

农村最初的人情往来,呈现出不同家庭之间相互帮助的互惠互助行为,体现农民之间淳朴互助、团结和睦的友好关系。而人情礼金提供了一种增进情感的物质纽带,是农民进行情感交流、经验分享、责任共担、归属认同的物质桥梁。最初由于经济基础较弱,人情网络的互动是通过互助劳动或者实物互换的方式进行。不过,这种实物互换最初在人情交往关系中凸显的是互助功能。然而,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流失,村民在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互助劳动逐渐减少。同时,邻里之间因为人员流动长期缺乏交流和互动,也让互助的意愿和行为相对减少。在调研中发现,闽东D村在早期举办酒席时,也会邀请族亲和村落中的人帮忙,既有不请自来帮忙端菜洗碗的族亲,也有主人家邀请村里善于烹饪的人来帮厨。互助关系是人情关系网络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这种互助的行为不会计算工钱,也无法算清楚来帮忙的人付出的劳动值多少工钱^[33],彼此形成了墨守成规的规则,让互助与人情持续下

表1 闽东D村某户乔迁的酒席人情

| 关系类型 | 人情随礼金额/元 | 人情礼品 | 是否回礼 |
|------|-----------|-------------|------|
| 直系亲属 | 2600~2800 | 一担米、一套被子 | 当即回礼 |
| 旁系亲属 | 1800~2060 | 一担米、一箱烟花或对联 | 当即回礼 |
| 同族 | 600~1060 | 一卷鞭炮 | 无 |
| 邻里 | 360~500 | 无 | 无 |

注:根据受访者所提供的礼金簿制作而成。

去。然而,随着人情逐渐异化,让传统淳朴的人情关系被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所绑架,人情关系网络从人就位的“互助性”变成钱就位的“功利性”,通过随礼来衡量人情关系的“厚薄”逐渐常态化。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导致农村社会资本的流失,这加剧了农村酒席人情更多受到利益的驱动,而不是传统中的互帮互助。一些农民在“黄道吉日”巧立名目,大办酒席,借机敛财,甚至还有些人以送礼的名义托人办事,扰乱农村人情秩序。随着人情名目的增加,人情开支水涨船高,不少农民受困于人情支出,承受与自身收入不太匹配的人情负担。人情支出内卷严重,攀比现象层出不穷,造成人情随礼从最初的互助性转变为功利性。

2. 演变主线:人情信任导向从“道德约束”到“利益驱动”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人情关系的行动原则呈现出一种泛血缘式的逻辑,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差序格局”,行动者在这种逻辑下会根据不同的场域采取不同的态度,即行动的特殊主义^[34]。传统的人情往来关系,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重视尊老爱幼、诚信友爱的传统美德。农村酒席举办的信任,是基于传统的礼俗文化和农村道德共同体意识。调研发现,闽东D村存在宗族观念和泛血缘关系的联系,在长期的人情往来中形成了某种认同感,其信任关系是基于道德约束与共同的价值观取向。在此基础上,闽东D村形成了两组不同的“关系与信任”的互动,即“强关系—高信任”与“弱关系—低信任”。然而,随着农村人口持续外流,熟人社会的人情秩序走向瓦解。由于外出村民和留守村民长期缺乏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和联系,让人际交往模式发生改变,与之相伴的是农村人情往来的互助功能被逐渐剥离,人情往来从“维系情感的纽带”变成人情“预期的投资回报”。传统人情往来基于情感联系和道德约束的基础发生了改变,举办酒席是否能获得经济利益或者物质回报,成为村民举办酒席的重要驱动因素。人口空心化现象持续加剧,村庄共同生活的减少,社会监督机制的缺失都让村民对人情礼金变得更加敏感,举办酒席更多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在人情往来中情感、道德的因素被逐渐淡化,而功利性的目的逐渐凸显,最终农村人情信任导向从“道德约束”走向“利益驱动”。调研中,有村民反映了相关情况。“自家不办酒席,那之前花出去的酒席随礼就要不回来了,这样算起来太吃亏了。都巴不得家里孩子结婚,老人做寿办酒席把钱收回来呢。”(访谈编号:TTY20240212)可见,不少的村民也试图借助举办酒席来回收以往支出的礼金,或者将人情往来当作是一种人情投资,期待获得预期的人情礼金回报。

3. 演变指向:人情消费从“求均衡”到“互攀比”

布劳认为:“社会交换无论是否以仪式性的形式出现,都包括那些创造着各种未来义务的恩惠,不是加以精确规定的义务,回报的性质不能讨价还价,而应该留给回报的人自己决定。”^[24]农村人情往来中的礼金交换,突出了社会交换的两个普遍功能,即建立友谊纽带和确立超过别人的优等地位。最初人情有来有往,相互给的礼金或者礼品差不多,形成一种人情往来的均衡。甚至赠送物品、提供劳务帮助或者信息资源,都可以作为人情往来的资源。但是随着人口大量外流,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收入随之增加,不同农民之间的经济状况和收入水平悬殊。闽东D村农民的贫富差距形成了一种隐形的阶层分化,村民开始通过攀比酒席规模和档次,来提升在农村重大活动中的话语权。“以前是别人给你500元以后就还500元,但是现在办酒席海鲜之类的涨价会比较贵。别人给你送500元,过几年别人办酒席肯定要加点钱回礼。像是涨利息一样,加点钱再凑个吉利数字,一般带8和6的数字比较吉利,比如600元或者800元。”(访谈编号:SGK20230726)人情礼金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人为提高了门槛。村民为了缩短人情的回报期竞相开发出各种新的人情名目,形成新一轮的人情亏欠,造成更多的村民通过人情酒来实现人情礼金的“平衡”。村民为了展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人脉,耗费巨资大摆酒席,并邀请亲朋好友和其他村民为自己充排面。“过年的时候,有时候同一天有五六家办酒席。村里老人多,很多是做寿的酒席。自己去不了,就让家里其他人去。实在没人,只能让其他去的人把随礼的红包带去给主人家。”(访谈编号:RHC20240213)从人就位到钱到位,人情异化后让人情往来的性质变味,传统人情消费的攀比加剧了人情活动“内卷化”、人情关系“功利化”、人情支出“高频化”和人情压力“复杂化”的特征。

四、农村人口空心化下酒席人情负担的“减负”路径

一定程度上,农村人情往来既有私人化的行为,也有公共性的行为,基层行政力量强行介入,容易带来“一刀切”的弊端,难以有效遏制人情负担的异化。对此,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探索农村酒席人情负担“减负”的有效路径。

1. 发挥传统文化制度功能和民俗调适作用让人情回归本初

举办酒席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民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酒席寄托着农民的家庭情感,承载着农民的生命意义^[35]。因此,移风易俗政策的推进要尊重农民的主体性与相关诉求,尊重传统人情往来的民俗惯例,在执行的过程中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第一,通过传统文化的软约束,让人情消费回归情感本位。传统人情仪式中的核心精神,饱含着丰富的情感因素,让人情交往成为情感的联结。基于文化的辅助性制度功能,尤其是规范功能、凝聚功能和认知功能,帮助塑造人们对酒席人情的正确文化认知,规范人情往来的行为准则。同时,通过文化的“软约束”,融入情感元素与乡村群众“讲情理”,让酒席人情回归合作互助的优良传统,让人情消费回归情感本位。此外,还要明确区分传统礼俗与陈规陋习,明晰人情礼俗文化的正本清源。对人情礼俗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追溯和恢复人情礼俗文化中健康、有益、正能量的一面。

第二,将农村传统的“权力式政策动员”转变为“人情式政策动员”,加快达成农村移风易俗的文化共识。政策的动员不能以行政力量单刀直入地强加于农民,应该以“人情式政策动员”的方式,调查村庄社会文化变革的需求,形成村民移风易俗的社会共识。在“人情式政策动员”的过程中,村干部可以结合线上与线下的渠道,直接对群众进行移风易俗的政策宣传。在国庆、春节等重要人情高峰期前后,抓住外出务工人员大量返乡的时机,通过宣传栏、宣传单、广播等方式,进行移风易俗、喜事从简的政策宣传,让移风易俗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

第三,积极对传统民俗进行调适,推广新民俗实践的典型案例。近年来部分地区出现的新民俗,如“请客不收红喜事礼金”和“请客不收礼”都影响着人情礼金收受规则的变化。调研中也发现,闽东D村也存在对于直系和旁系亲属送的礼金,会当即返还部分礼金的现象,以此减轻彼此的人情礼金负担。对此,地方政府应该对传统人情礼金往来的民俗进行调适,让传统人情仪式回归理性。积极推广“请客不收礼”新民俗的典型案例,或者塑造具有本地特色的新民俗实践案例。尤其是鼓励村庄中的“宗族精英”积极引导“请客不收礼”的实践,明晰“不收礼”的宴请有助于强化其声望地位,加强村民对他们的尊重和认可。

2. 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拓展农民家庭的生存韧性

当前国家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扶贫兜底机制、多样化的社会保障机制、外出非农就业的盈利机会,不断夯实了农民的生存韧性,也逐步影响农村关系型秩序的生成^[36]。但是,农村由于保障体系不健全,人情依旧发挥着重要的防范风险的作用。如何兜底农民的生存底线、化解农民的生存风险,强化农民家庭的生存韧性是农村人情负担“减负”的关键。

首先,规范基本社会保障项目设计,推进农村补充性社会保障的完善。基本保障项目在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加剧城乡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让农村将人情消费看作是风险保障的一部分。对此,应该根据社会成员对基本风险保障需求的变化,完善基本保障项目体系,建立面向全民、统筹城乡居民和职工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生育津贴制度^[37]。对农村地区扩大部分基本保障项目的惠及范围,同时完善补充性社会保障项目。尤其是探索建立农民职业保险制度,完善农民养老保障的层次性,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体抵抗风险的能力^[38]。

其次,拓展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强化农民的生存韧性。在农村人口空心化下外部就业机会逐步开放,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但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难以保障其家庭的生存韧性,转而寻求人情关系网络来抵抗风险。一方面,拓展农民的外部就业机会,要通过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多渠道就业机会的打通,提高农民的就业质量。另一方面,盘活本地资源为农村提供本地非农就业机会,要通过构建具有竞争力和显著经济效益的农业产业链,深化产业协作

和利益分配方式,带动本地农民实现产业增收。农民收入来源渠道的拓宽和收入来源的增长,将有效强化其家庭生存韧性。

最后,提升农民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加强农民抵御风险的“筹码”。外部资源输入的政策惯性,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但是并没有带来农民生计能力的同步改善。提升可持续生计能力,有助于增强农民抗灾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一方面,鼓励农民返乡创业或者就业,掌握农业相关技能,科学配置生计资本,提高其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从而提高农民自身生计资本的总量^[39]。另一方面,通过对当地特色文化资源和文化产品的扶持,带动文旅产业的发展,并通过文旅产业的振兴促进生计资本的可持续增长。

3. 强化群众性自治组织整顿无序跟风攀比的不良风气

农村移风易俗领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引导村民移风易俗,参与制定村规民约上有着独特的影响力。对农村酒席人情负担的治理,应充分发挥以移风易俗为基础所形成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

第一,对已有的移风易俗方面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要将“制度刚性”与“治理柔性”相结合,通过“政策主导”走向“政策引导”。在农村人情往来活动中,主导型的政策应该尊重村庄的民俗文化传统,以及农民的主体性。通过群众性自治组织,实现正式的法律法规与乡村社会的村规民约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实现治理柔性。但是,仅有治理柔性难以实现农村移风易俗的有效性,还要结合“制度刚性”。即政策的制定要结合当地乡村的文化传统和人情习俗,让刚性的制度更加贴近村民的价值观。政策的推行不能偏离农民的需求,尤其不能改造村庄传统习俗的核心部分,不能违背家庭伦理道德和农民自身的生命价值依托。

第二,通过赋能群众性自治组织,让村规民约与民俗形成多层次的互动体系。对农村在移风易俗领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提供资源支撑、技能培训,以增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服务能力、管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村规民约既不是正式的法律法规,也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操作性,并非所有村民都会遵守。所以应该对村规民约进行适时更新,将村民对人情往来的实际需求,农村民俗的本质与发展纳入其中,从而获得更多村民的遵守。让村规民约与民俗发展之间保持良性互动与沟通,形成多层次的互动体系。

第三,通过群众性自治组织制定肃清农村人情风气的激励措施,整顿无序跟风攀比的风气。一方面,移风易俗领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要积极调动农村“乡贤”“宗族精英”的力量,联合成立整治人情负担的专项激励基金。将激励基金中的金钱,用来奖励简办酒席的村民。通过金钱的激励,给予遵守移风易俗的村民实质性的奖励。另一方面,移风易俗领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应该及时吸纳一些常年在外经商或者打工返乡的农民,这些返乡的人和留在农村的村民,更能产生亲近感和共鸣。通过群众性自治组织共同整顿盲目攀比、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有助于帮助农民厘清人情负担的是非逻辑,树立正确的人情观念,从而遏制人情异化的趋势,缓解农村人情泛滥的问题,走出人情负担的怪圈。

五、结论与讨论

与1990—2010年农村人情异化的“隐性负担”相比,2010年后农村人口空心化下的农村人情从“隐性负担”变成了“显性债务”,并出现了新的不同。首先,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移动支付的普及,让流出的青壮年劳动力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的方式,选择即时支付人情礼金,这导致他们即便脱离村庄场域进入县城或者城市,仍然无法回避农村人情往来。此外,出于对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等亲属的庇护保障需求,让外出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能轻易脱离农村的人情关系网络。其次,随着青壮年大量流出,农村留守的老人和妇女等群体成为人情往来的实际代理人,他们需要承担人情礼金垫付的压力。而农村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让原本依靠互助劳动的农业生产、婚丧嫁娶等活动,因为劳动力不足而转向依赖市场化服务。传统互助劳动体系瓦解,从“互助互惠”转向“金钱交

易”,互助劳动的货币化加重了农村留守群体的压力。此外,由于不少农民也将人情礼金往来当作是非正式保障的补充,人情仪式从“纽带维系”变成了“人情储蓄”,加重了人情负担。最后,进城的青壮年群体接受了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返乡大肆操办酒席以彰显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满足自身虚荣心理,并引发人情攀比的不良风气。尤其是城市元素的融入,外包酒席、酒店酒席、引入策划公司都推高了人情仪式成本,也加重了人情盲目攀比和跟风。在农村人情负担的治理上,行政命令强制改革的措施,不仅难以起到治理人情负担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激起农民的逆反心理与舆论的反噬。当前农村已有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规则,不能用行政力量强行介入纠正,或者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移风易俗,应尊重乡村的多元文化需求与多元价值选择。

对于农村人情问题,农民的具体收入、收入来源方式、收入的稳定性等因素都会影响农民对人情负担的承受度。不同农民对于人情负担的可承受度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农民视人情礼金为负担,有的农民视人情礼金为维系相互关系或者托人办事的物质桥梁,人情礼金是否成为负担因人而异。而基于个案研究的调查,选取的案例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对于其他地区人情问题的相关研究存在类推性难题。本文致力于对个案案例相关细节的把控和刻画,试图以个案嵌入的方式,更好地解读农村人情负担的问题。尽管发现了案例研究所具有的地方特色,但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酒席人情问题存在较大的差异,未来的研究应从比较的视野探讨这种差异性,或对人情问题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5-02-28)[2025-04-02].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502/t20250228_1958817.html.
- [2] 胡小武.因村施策:农村人口空心化陷阱及发展路径转型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4(6):50-60.
- [3] 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5-02-24(1).
- [4]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 [5] 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J].读书,2011(1):19-25.
- [6] 陈文江,马瑛.双重结构压力下的农民理性:“零存整取”的人情实践[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1(6):67-77.
- [7] 刘恋.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化的现代性转型[J].湖湘论坛,2022,35(3):120-128.
- [8] 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0-27.
- [9] 罗必良,耿鹏鹏.乡村治理及其转型:基于人情关系维度的考察[J].农业经济问题,2022(10):6-18.
- [10] 宣朝庆.社会治理传统的再发明——以礼治为核心的分析[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9(6):5-17.
- [11] 冯必扬.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1(9):67-75.
- [12] 朱政.基层法治的实践生成——以鄂西地区仪式性人情异化的治理为切入点[J].法商研究,2016,33(4):55-64.
- [13] 柯杰升,罗必良.宗教与人情——关于社会纽带的经济学考察[J].世界经济文汇,2023(1):102-120.
- [14] 阮极,汪月.仪式资本内卷化:粤东潮汕地区A县人情酒的变迁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23(10):215-224.
- [15] 李敏,张利明.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的态势、成因及对策——基于全国200多个村4000多家农户连续3年的调查[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2):94-100,114.
- [16] 肖琳.结构混乱与权力下乡:农村人情异化的形成机制及其治理[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1,23(4):66-75.
- [17] 郑家豪,周骥腾.农村人情治理中的行政嵌入与规则融合——以重庆市川鄂村整顿“整酒风”事件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20(5):40-51.
- [18] 谢立中.两种“中国社会(学)理论”及其再审视[J].学术月刊,2023,55(9):102-112.
- [19] 周大鸣.差序格局与中国人的关系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1):17-24.
- [20] 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3):11-22.
- [21] 陈振明,黄子玉.数字治理的公共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6):9-14,124.
- [22] HOMANS G C.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8, 63(6):597-606.
- [23]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 [24] 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 [25] 杨华.农村人情竞争的区域差异及其治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2):71-81,158.
- [26]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7] 赵清军,何军.从谋生到融入:社会网络何以提升农民工社会参与?[J].现代经济探讨,2023(9):98-108,118.

- [28] 罗娟,罗骞.移动支付、家庭包容性增长与共同富裕[J].消费经济,2024,40(5):79-91.
- [29] 蒲晓红,王雅,赵海堂.基本养老保险、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风险感知——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的比较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1):105-116.
- [30]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31] 梁海兵,张华.乡土关系重构中农村人情消费能否接续关系信任?——基于社会偏好理论的路径分析[J].社会发展研究,2023,10(3):105-126,244.
- [32] 卢宪英.社会比较理论视角下的农村攀比现象考察——以山东省3市10村为例[J].中国农村观察,2014(3):65-72.
- [33] 何奇峰.再论“社会基础”:关系本位社会中的农业用工研究[J].开放时代,2024(3):134-152,8-9.
- [34] 刘津.人情关系重构与乡村善治的路径探索[J].重庆社会科学,2020(3):131-140.
- [35] 周飞舟,任春旭.情礼相称:一项关于农村酒席的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0(5):65-74.
- [36] 耿鹏鹏,罗必良.乡村治理秩序重构:机理与现代化方向[J].世界农业,2024(4):61-71.
- [37] 何文炯,刘来泽.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4(3):135-147.
- [38] 刘光旭,蒙慧,牛海.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解困的国家作用[J].农村经济,2024(2):103-113.
- [39] 郑志龙,李雨臻.乡村文化振兴视角下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路径探析[J].中州学刊,2024(5):48-54.

How the Burden of Ceremonial Cash Gifts Emerges Under Rural Hollowing-out Rural Population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D in Eastern Fujian

YE Ying, RUI Guoqiang

Abstract The issue of burden of ceremonial cash gifts in rural area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midst the current trend of rural hollowing-out. Alleviating this social burden is crucial for transforming outdated customs a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vilized rural etho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nd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relationship-trust-behavior”. Employing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D in eastern Fujian, it delves into the emergence of the burden of ceremonial cash gifts in the context of a hollowing-out population and pathways to reduce this burden. The case study shows that in solidary villages like those in eastern Fujian, the mechanism generating this burden revolves around the continuation of social network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risk perception, the functional alienation of social reciprocity, and the influence of vanity. This process follows an evolutionary logic: reciprocal interactions shift from “mutual assistance” to “utilitarianism”, the orientation of trust within these exchanges moves from “moral constraint” to “profit-driven”,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s related to social reciprocity change from “seeking balance” to “mutual competition”. Therefore, pathways to reduce this burden are proposed: leveraging the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customary adaptation to return social reciprocity to its original purpose; improving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enhance the survival resilience of peasant families, and strengthening mas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to rectify the detrimental practice of reckless and emulative one-upmanship.

Key words hollowing-out; the burden of ceremonial cash gifts; distortion of social reciprocity; governance through social reciprocity

(责任编辑:余婷婷)